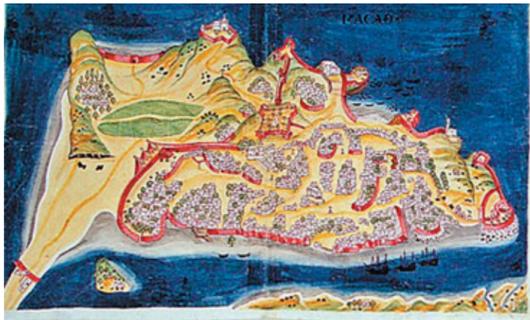


歷史空間

早期澳門市政體制及澳日貿易的若干問題



威印平博士。



澳門古代地圖。

澳門是葡萄牙人於明代末年向明代政府租下的一塊地，從1575年到現在大概有四百多年的歷史，橫跨明清兩代，於中國歷史中為一最久遠的西方殖民地。16至17世紀的澳日貿易不僅成為葡萄牙東方航線中獲利最豐的貿易線路，並且對澳門自治政體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重大作用。就貿易商品的種類及其運送路線而言，澳日貿易顯然是傳統中日貿易的延續和新興中外貿易的發展。它不僅改變了東亞的傳統貿易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澳門這商人自治城市的市政體制演變。

威印平博士為哲學博士，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1982年廣播電視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1990年考入杭州大學歷史系，1993年獲碩士學位(地區國別史)。1993至1995年任職於杭州大學圖書館，1995至1999年在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工作。1999年獲浙江大學博士學位，同年轉入哲學系工作至今，先後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宗教學方向及專門史方向)。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為遠東天主教史、宗教傳播與文化關係史、日本文化史、中日關係史。

1. 商業行會與貿易船長的商務契約

澳日貿易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葡萄牙王室一直以「Capitao-mor」(加比丹·莫爾制度)的形式，對包括澳日貿易在內的遠東商業航行加以嚴格控制。加比丹·莫爾在16世紀前指王家船隊司令，16世紀中期因軍事目的而在本土廣泛設立此職。到後期，他不僅擁有對麾下船隻的指揮權，亦可以國王的名義統制其所到之處的文武官員，其職權有如「海上巡撫」或「移動總督」。

在這壟斷性的官營體制下，澳門葡商人的經濟權益受到極大的限制。出於生存壓力，他們建立名為Armacao(阿爾瑪薩)的同業行會，由它代表全體澳門商人與前往日本的船長訂立商務契約，以確保澳門市民的基本利益。關於阿爾瑪薩的組織結構與運作方式，李瑪諾神父在《關於澳門居民將生絲送往日本的耶穌會契約及Armacao的報告》(1610)中解釋：「葡萄牙人攜帶中國商品前往日本的最初時期，沒有國王給予的許可書，任何人都不得進行這種交易……當地的加比丹·莫爾支付一定開金的船費與商人締造協議，使各商人將其希望運送的庫存商品裝上船隻。」李瑪諾神父還記述了船長的義務、回報及澳門市民對他的監督：「三名被選舉者、即居民代表，分別為販賣生絲而前往日本的代理人、協助代理人處理文件的書記，在日本活動的情報官員……此外，還選舉數名事務員，向這些人支付薪金，作為議定契約的報酬。」

我們可從上述商務契約內容作多方面解讀。從政治層面上，該契約表明以往壟斷性的官營貿易體制開始走向官民共同經營的體制。在商人自治城市的澳門，普選代議制的市政體制與商會關係密切。由市參事會召集市民選出的三名代表，不僅有權決定每人的生絲份額，而且還負責商品的利益分配。從經濟角度上說，上述契約是一份縝密而嚴謹的商務契約，它對相關各方的權利和義務作了明確規定。

2. 澳日貿易與耶穌會士的關係

由於大航海時代的歷史屬性，有關澳日貿易的任何討論都無法迴避商業與宗教的複雜關係。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曾於1579年10月記錄：「日本耶穌會士的

維持主要依靠定期船貿易。根據在中國(澳門)負責定期船事務的葡萄牙商人與我們訂立的契約，日本耶穌會士每年從這一貿易獲得大約4,000克魯扎多的收益……如果不能全部出售，也將按照該公司出售其它所有生絲的價格進行計算……從中大致可獲得2,000特卡特的利潤。」可見澳日貿易與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密切相關，並成為後者的主要經費來源與換取傳教許可的政治籌碼。

當日本走向統一王權江戶時代後，澳日貿易及其所帶來的巨大利益，不僅為教會帶來必需的傳教經費，亦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政治前提。所以自豐臣秀吉於1587年發佈首個傳教士驅逐令到江戶幕府1639年實施鎖國令為止，禁教命令雖層出不窮，卻少有付諸實施。1591年後，陸若漢(Joao Rodrigues)神父開始陪同抵達日本的定期船船長，對豐臣秀吉做每年一度的例行拜訪。1601年，他又被德川家康任命為私人貿易代理商。正正是利益驅動，有關各方才極力參與其中；但同樣，雙方因利益之爭而引發激烈矛盾，使得澳日貿易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

3. 澳日貿易終結的原因

從表面看，導致澳門貿易中斷的原因是由於江戶幕府在1639年嚴厲施行的「鎖國令」，但不難發現這結果是由諸多複雜的因素所形成的。

對澳門葡商以及耶穌會士而言，後來居上的對手是新教的荷蘭人和英國人，在企圖佔領澳門失敗後，這些清教徒乾脆像海盜般公開地搶劫。他們還在成立於17世紀的東印度公司統一指揮下，加快向日本前進的步伐。英國人亞當斯因禍得福，在會見德川家康後，很快成為其私人顧問，改名為三浦安針，並領受封地屬民。由於他的協助，荷蘭人於1609年獲准在平戶建立商館，正式開始對日貿易。對於一直為天主教所困擾，但又不得不在對外貿易上依賴耶穌會士的江戶幕府而言，荷蘭人的到來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新選擇。另一方面，江戶幕府開拓海外市場的努力及其與葡萄牙人的利益衝突，亦是導致雙方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認為，日本商船於1608年在澳門與葡萄牙人的衝突是澳日貿易走向沒落的重要轉折點。瓦斯孔塞洛斯(José Frazo de Vasconcelos)在《葡萄牙人在東方》記載：「1608年冬天，一艘屬於有馬大名的中國式帆船在澳門港越冬。該船船員與葡萄牙人發生了一系列衝突，直至一天或許他們認為有足夠力量佔領港口了，於是同葡萄牙人交手。安德烈·佩索阿事先已得知這一情況。他趕到衝突地點，帶着一隊人打散了日本人。日本人躲進兩座房屋。安德烈·佩索阿下令包圍房子，放火焚燒。在逃進大火時，一些日本人被擊斃，首領被捕，在獄中以搶劫罪將其絞死。澳門主教及其他人士替15個左右死裡逃生的人求情。一些人得到了寬恕，條件是必須簽署安德烈·佩索阿準備的一份文件，宣布他無任何責任，並承認是日本人先出手。日本人簽了字，但回到日本後，向其君主的敘述十分不同，說是被迫簽字的。」

如前所述，澳日貿易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商業交易，而是合各種政治力量、各方利益需求間相互衝突、相互制約，最後達成某種平衡的產物。因此，當這種平衡被打破後，現有的貿易形式必然發生變化，而耶穌會苦心經營多年的傳教事業亦不可避免與澳日貿易同歸於盡。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來鴻

坐看牽牛織女星

■王兆貴

晴朗的夏末秋初之夜，人間草木飄香，天上繁星閃爍，一道白練似的銀河橫貫長空。在它的兩岸，是隔河相望的牽牛星和織女星。

據《荆楚歲時記》記載：「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役，織成雲錦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傳說到了這一天，那些唧唧喳喳的喜鵲，都要結伴飛往銀河，為即將相會的牛郎織女搭橋。小時候，聽大人這麼說，我們還特地瞪大眼睛觀察過，周圍確實看不到喜鵲了，也就信以為真。

「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在童年時代的鄉村，每到七月前後，孩子們都會躺在天井的涼席上，仰望滿天星斗，聽長輩講牛郎織女的故事。一邊眨着好奇的眼睛聽，一邊順着大人的手指，在銀河兩岸搜尋牛郎星和織女星。但是，天上的星星太多又太小，看來看去就混了，怎麼也無法定位。大人就告訴我們，織女星是菱形的，由四顆小星星組成，像一把織布的梭子；牛郎星是弓形的，由三顆小星星組成，像一條扁擔，那是牛郎挑着他和織女生的兩個孩子。那條明晃晃的銀河，是王母娘娘為了維持天上人間的秩序，用玉簪劃出來的。

牛郎織女的傳說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這個故事中，美貌的織女看中人間真情，勤勞的牛郎拒絕榮華富貴。王母娘娘的干預，阻礙銀河的阻隔，都沒能讓他們屈服，至今仍在深邃的夜空中遙相凝望。純潔無暇的愛情凄美而又悲壯，古往今來的文人墨客，競相吟詠，傾情謳歌。古詩詞中的描述，最早見諸於漢代：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唐詩以降，吟誦這一典故的詩詞愈益多了起來。最為人稱道的是宋代秦觀的那首鵲橋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銀河兩岸那兩個星座固然寂寞，但並非血肉之軀，何嘗有七情六慾？多情的是生活在塵世的善良百姓。當現世的情緣受困，理想的美夢破碎，就只好把自己排遣不了的苦悶和實現不了的期許，由人間移情於天上。於是，那兩個星座便有了靈性，便有了寄託。在神話與傳說的滋潤下，人類的情感也隨之豐富而又浪漫起來，不再那麼單調與淒苦。

「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東晉葛洪在《西京雜記》中說：「漢祿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人俱習之」。這是我國文獻中最早關於乞巧的記載。爾後便逐漸沿襲開來，代代相傳。到了這一天，女孩子們便會蒸巧餠、烙巧果子，然後連同紅菱、白藕等，擺到庭院的供桌上，燃燭焚香作揖，乞求天仙賜巧。拜過之後，手執彩線對着燈影穿過針孔，一口氣能穿七枚針孔者叫得巧，稱為巧手。七夕之後，姑娘們將所製作的小工藝品、玩具互相贈送，以示友情。有些地方的乞巧節，還帶有競賽的性質，類似古代門巧的風俗。在鄉間，紀念七夕的活動比較簡樸，很少拜月、賦詩之類的貴族雅興，但主題比較集中，且與勤勞美滿相關，可以用「美」和「巧」兩個字來概括。「美」是指和美的姻緣；「巧」是指勤勞的智慧。

在我故鄉的村民家中，至今還保留着製作巧餅的模具，這種木製的模具一般有大小兩種，大的約為半尺見方，只鑄刻一種圖案；小的為長條形，可鑄刻七種以上圖案。這些圖案形狀各異，標誌吉祥，通常為花卉、水果以及小動物等。七月七日之前，將調好並發酵過的麵團，塞進模具中按壓平實，翻過來輕輕一磕，造型優美的巧餅便會落在面板上。待做齊了，再分批放進預熱的鐵鍋(餅鏞)中慢慢地烙熟。小巧玲瓏的花色巧餅最討孩子歡心，他們會將這些巧餅間以沙果，用五彩絲線穿起來，提溜到大街上炫耀，與小夥伴們分享。

到了今天，隨着現代氣息的浸染特別是功利性因素的影響，不少民間習俗已淡出人們的生活，並出現了本土節慶與西洋節慶夾不清的爭議。

但是，無論怎麼說，七夕仍然是老百姓普遍喜愛的節日，也是我國民間最具浪漫色彩的節日，就像仲夏夜之夢一樣，讓人們充滿了美妙的幻想。對後生們來說，民間紀念七夕的習俗也算是一種啟蒙和教化。它潛移默化地曉諭世人：善良是美德，勤勞生智慧，依靠勤勞與善良方能建設和諧美好的人間家園。



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網上圖片

文化觀察

熱點詞評

■文：陳科科

武俠

相較於被谷德昭評為《Social Network》的《投名狀》，其實可給予《武俠》更高評價，至少，這不是一套陳可辛出品的「投機、沽名、作狀」。《投名狀》徹頭徹尾的機關算盡，無論李連杰的野心、劉德華的粗疏、金城武的天真，整部戲沒有感情入骨，這非關有沒有個人經驗與角色串連，而是，觀眾情感很難跟算式串連。而《武俠》講的退隱、求真、癡迷，本應疏離，卻因為筆劃簡單幹練，一撇一捺清晰，觀眾可以看清他們想透過武俠兩隻字去講甚麼是武，甚麼是俠。

戲首湯唯手執甄子丹衫角的那種緊繃，吐露了她後來忽然自白身世，更促使當她質問甄子丹是否將她當成「退隱生活申請」(借當地人來入族譜)時的狼傷作基礎。

甄子丹起床時沒有睜眼，而把她的手放在被角，那是對緊繃的體諒(不是《葉問》那種肉麻的尊重老婆對白……)卻同時反證了他為了退隱而利用一個河水相逢(真的在河中相遇嘛)的村姑此等機心。

然後是美得繃緊神經的詩畫雲南美景。那渡橋、稻田、做紙，沒有上次的作狀，純粹空靈。筆鋒直轉就講到甄子丹如何「誤殺」通緝犯，那陰差陽錯的搏打，不似成龍那種硬要「鬥雞」[裸衣]的硬滑稽，無驚喜但會微笑。然後金城武登場，將故事拖入法醫的科學角度(是維清末民初)，金城武因為一度心軟，所以一切依法行事，堅持的，是法

無人情的派系。於是，被識破是逃犯的甄子丹會一時行善，將他放逐回鄉城，他，卻為了不能枉法而回去捉犯。

陳可辛曾說科學角度是他今次想表達的東西，通過那種CG脈脈，呈現老派武俠不能/不為的畫面，跟最近喬靖夫《武道狂之詩》原理相近，一拳一腳都好似清楚講明如何施展，遺憾是對戰者的想法如何，當然有無智取無力敵，無法在迅猛拳腳交加間交代，這也是武俠電影始終無法跟小說企及。如果說是否如廣告所言的「武俠改變武俠」，我又覺得這未至於那麼巨大的難題，在不少類型片已然屢見不鮮(連《Hangover》都有懸念啦)，金城武的解說，也在高速唸對白中流於自說自話(他其實只是單靠現場環境想像，沒有進一步的化驗、推演)。陳可辛說部分刪剪片段，包括甄子丹本為左撇子，而苦練右手，金城武透過他的鞋履而被誤導以為他是天生用右手，這些更嚴密、帶質感的趣味，卻被斬去，這才可惜。

全片最為驚喜，就是原「獨臂刀」的王羽，雖然乖張的反派設定很典型，那場抱孫餵飯卻帶來全片難得的張弛，而我們都因而相信，即使宇宙第一好打的甄子丹都不會打得贏他，所以那叫不少觀眾啞然的結局，卻順理成章(唯有等天收……)而金城武在最終戰功成身退，令本來為了行俠而帶來更多殺戮的他贖罪，不用武而行了他的俠。事實上，所謂止戈為武，任由甄子丹解甲歸田、放任罪犯改過，不用武就能化去糾紛，是否才是俠道？

宜家的自助理念

■文：王曉華

來自歐洲的連鎖商場宜家以賣傢俱為主業，但其附屬餐廳的生意也得好讓人吃驚。從表面上看，這家餐廳的服務實在不怎麼樣——去那裡吃飯的人不但要自己取飯菜，而且還要親自收拾碗筷，半點上帝的氣派也沒有。奇怪的是，人們似乎挺喜歡這種平和的自助氛圍，面積不小的餐廳時常擠滿了慕名而來的消費者。

餐廳僅僅是宜家這個商業王國的縮影，它擁有的每個商場都是自助的場所。從許多消費者的反饋看，這家連鎖商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恰恰是因為它引入了一種大多數國人尚感到新鮮的自助理念——通過主動的自我服務，顧客可以與商家「一起創造價值」。

在這裡，顧客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等待恩賜的奴僕，而是與商家平起平坐的合作者。他們需要學會主動參與，甚至迎接難度不小的挑戰：比如，閱讀商品目錄，向經營者諮詢，在複雜的商品王國中找到自己買的東西，嘗試着自己運輸和組裝傢俱，等等。於是，買和賣的界限模糊了，顧客不但能體驗到在家的親切感(有的人甚至在家居館睡着了)，而且會收穫與經營者共事的快樂。「把吃過的餐具送回」就是顧客參與合作的具體方式之一。顧客的自助式勞作降低了商家的經營成本，商家則把相應的價值回饋給顧客——消費者能夠喝到免費的咖啡，享用可樂時可以不斷續杯。顯然，合作的結果是雙贏。許多人到這裡購物，就是為了體驗這種奇妙的角色轉換。



對於中國消費者來說，體驗自助氛圍是件好事。由於複雜的因緣際會，我們已經習慣了在僕人和主人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尚不習慣在商業空間中平等合作。

1976年之前，中國的商店和餐館大都屬於國營單位，顧客前去消費時難免要看國老大的臉色。在那個匱乏的時代裡，許多商品都被放在櫃檯的後面，位於消費者不能逾越的禁區。沒有經營者的恩准，他們連觸及商品的機會都沒有。經營者掌握着分配商品的權力，自然會放射出某種霸氣。面對他們，消費者常常覺得自己矮了幾分，只能扮演卑微的角色，甚至為小利而折腰。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競爭變得激烈，商家又拋出「顧客就是上帝」的口號。於是，消費者似乎立刻升到了高處，完成了夢幻般的地位轉換。不少人開始在商場和飯店裡吆五喝六，頤指氣使，要做主人的威風，服務員之類的群體則常常只能飲氣吞聲。此後，許多國人到餐廳和商場消費，絕非僅僅為了佔有商品，更想享受被伺候的滋味。

不過，同樣的消費者面對更有權勢的商界大腕，則會立刻從上帝的位置上退下來，再次體驗卑微和無奈。事實上，無論是被當成上帝，還是做受氣型的消費者，平等關係都是缺席的——儘管商家和顧客的角色在變換，但等級制觀念仍然在支配着人們的思維與行為；大多數顧客不是處於高位，就是體驗卑微和無奈，唯獨缺乏與經營者平等合作的機會。相比之下，引入自助機制的商場展示了顧客和商家合作的具體路徑，實際上演繹了一種平等精神。

到這裡消費的人則經歷了現代精神的洗禮，等於上了堂生動的公民教育課。可以想見，隨着時間的推移，國人會日益理解這種自助哲學的精髓，學會與他人平等合作，完成與時代精神相稱的角色昇華。

根據我的所見所聞，自助與合作已經是當今世界的一種主流消費模式。由於勞動力價格的上升和平等精神的普及，歐美乃至日本的商場和餐廳大都引入了自助體系。在這些國家享用麥當勞之類的快餐，顧客都需要同時扮演消費者和勞動者的角色，自己清理餐具實乃份內之事。相比之下，我們的經營模式已經有落伍之嫌。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商家將自助消費與合作理念引入中國，實際上是在為我們補課。這樣的商家，這樣的自助，這樣的合作，無疑越多越好。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